

中外名记者丛书

邓拓

王必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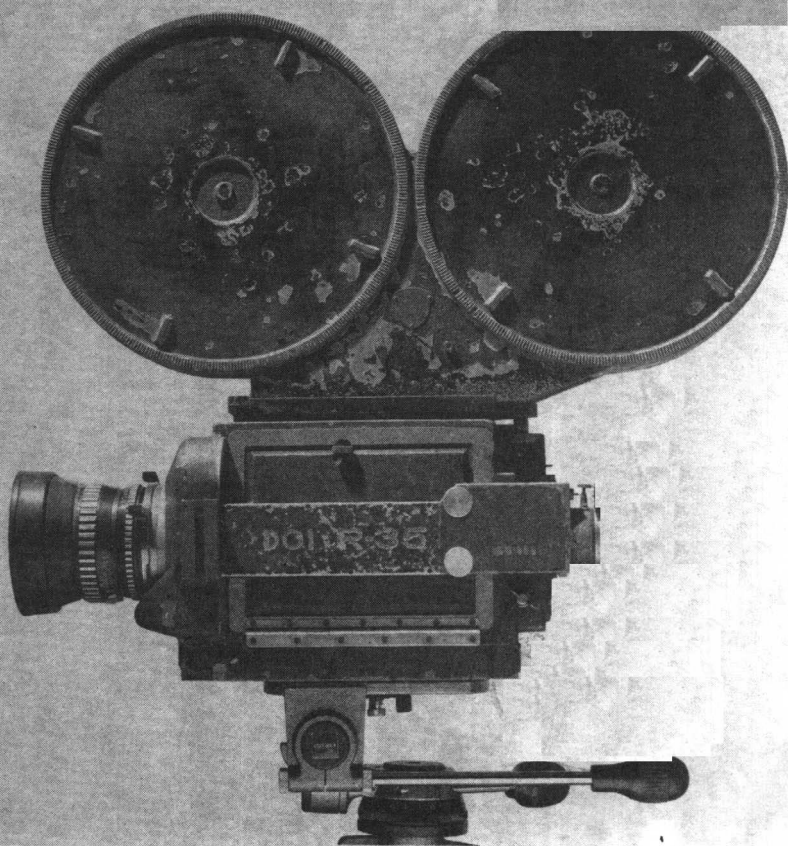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外名记者丛书

邓 扎

王 必 胜 著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拓/王必胜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1

(中外名记者丛书)

ISBN 7-80002-822-8

I. 邓… II. 王… III. 邓拓—评传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5)第 23343 号

书 名: 中外名记者丛书——邓 拓

著 者: 王必胜

责任编辑: 颜景政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邮编: 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铁建印刷厂

字 数: 176 千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 875

印 数: 1 - 1000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2-822-8/G·244

定 价: 25. 80 元

编者的话

中国、外国都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由于他们发表过大量成功的新闻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的道路，借鉴他们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培养我国新一代的名记者，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服务。

这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是：每位名记者各占一本，每本 15 万字左右。前面是专家对他们的评传，后面是对其作品的精选。

目 录

人物评传	(1)
文化赤子:邓拓	(1)
“未冠即能诗”	(1)
组织“野草社”	(3)
“补读平生未见书”	(5)
铁窗风雨唱“高歌”	(6)
崭露新思想的光芒	(8)
“中州客梦寒”	(10)
“奋翅越重山”	(12)
“战史编成三千页”	(15)
数百篇社论的写作	(20)
党的新闻事业的财富	(25)
重要的理论贡献	(30)
“人间长此记深情”	(36)
“战歌诗思倍匆匆”	(41)
文艺理论和散文创作的丰收	(44)
“为新生活而斗争”	(48)
政论家的思索	(52)
《人民日报》改版的前前后后	(54)
新闻理论的新贡献	(58)
“文章常助百家鸣”	(61)
“屈指当知功与过”	(64)
主编《前线》杂志	(67)
“大手笔,小文章”	(69)
“君爱文物非爱宝”	(71)
不屈的抗争	(74)
“燕山吐凤化悲音”	(77)

不能忘却的纪念	(81)
作品选编	(83)
新闻理论研究	(83)
论党报与党的工作	(83)
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	(87)
关于报纸的社论	(93)
我们对报纸社论的看法	(93)
报纸需要什么样的社论	(96)
关于社论的选题计划	(100)
怎样进行社论的写作	(103)
在社论发表的前后	(108)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闻工作	(110)
新闻工作者不可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	(110)
怎样掌握新闻工作的客观规章	(111)
要善于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116)
具体掌握辩证法是做好报道的关键	(122)
散文、特写	(129)
《中国青年》和恽代英	(129)
国殇·诗魂·诗的永生	(132)
访“葡萄常”	(135)
陈仓道上	(139)
可贵的山茶花	(142)
听琴记	(146)
令人怀恋的漓江	(150)
杂文	(153)
废弃“庸人政治”	(153)
生命的三分之一	(155)
欢迎“杂家”	(157)
少少许胜多多许	(159)
“胡说八道”的命题	(161)
事事关心	(163)
形而上学的没落	(165)
八股余孽	(167)
“伟大的空话”	(169)

专治“健忘症”	(171)
新的“三上文章”	(173)
你赞成用笔名吗?	(175)
有书赶快读	(177)
观点和材料	(180)
文章长短不拘	(182)
生平年表	(184)

人物评传

文化赤子：邓拓

蜿蜒秀丽的闽江，滔滔东流而下。这条古老的河流，以它甜美的乳汁哺育着八闽大地。在它的下游，有一座经济、文化的历史重镇——福州。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福州曾是它们入侵中国的一个“口岸”，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经济文化的浸入，这里得风气之先。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福州就出现了像林则徐、严复、林纾等有影响的人物。我国当代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文化战士、诗人、杂文家邓拓就出生在这里。

“未冠即能诗”

1912年2月26日，邓拓出生在福州市乌石山麓一个依山而建的小院落里。

邓拓出生时的小名和后来读书时的学名叫子健。他的父亲邓宜中（字鸥予）是清代最后一科举人。在广西任过县知事。辛亥革命后，他有感于兵燹匪祸的荒乱，辞职回到福州任中学国文教员。他对孩子管教很严，规定黎明即起，读书写字做“早课”。

邓拓五岁左右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从练习写“大字”接触了一些古代诗文。二哥邓仲舟是美术专科的学生。他常常带邓拓到附近乌石山上“搜奇访古”，接受传统文化滋养。乌石山的古迹十分丰富，这里的怪石峻奇、洞壑清幽。山上的邻霄台、天章台、道山亭等古建筑密集着二百多段摩崖石刻，有唐代书法家李阳冰、宋代程师孟、蔡襄、朱熹等人的手迹。来到这里，在幼小的邓拓心里展示了一个神奇瑰丽的知识世界。他看二哥写生作画，听讲古诗文，间或兄弟俩用自制的“扫帚笔”，蘸着清水在石砖上练字画画。

邓宜中先生爱好收藏，家中大书柜里有不少“经史子集”的

古书，这也是邓氏兄弟们发蒙的阅读教材。邓老先生严格安排孩子们学习时间，邓拓的“一日一课”先是背诵唐诗、念《三字经》之类，然后练习各类书法描红。

七岁以后，邓拓进入闽侯小学。每每在放学回家，除了家务劳动外，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闭门读遍家藏书”，这占人自勉的诗句曾是邓宜中教育孩子们的信条。他有感于世道的变乱和动荡，教育子女们“多读书，读了总是有用的”。

当然动荡发展的时局不能不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反响。邓拓上小学不久，福州发生了日本浪人驱打迫害基督教学生的事件。这是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后，福州青年学生积极响应，抵制日货，爆发了震惊全国的“闽案”。夏天，福州各学校的学生联合会为声援京津沪学生的爱国行动，在魁辅里谢氏祠堂集会游行。作为一个刚懂事的孩子，邓拓对五四运动背景的了解是不会深刻的，但“五四”以来，学校罢课、游行，商店关门，进步教员讲授严峻的时局等，“八闽气象，为之一壮”，使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振奋和激动。当举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勿买日货”的标语和高呼“还我青岛”的口号的游行大军走上街头时，邓拓和同学们递上毛巾和茶水，有时，竟尾随游行队伍，“通宵达旦，彻夜不归”。

1923年，邓拓升入三牧坊中学。它的前身是清代的凤池书院，是福州较早创办的一所中学。学校师资较强，校纪严明，当动荡的时局在福州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后，这里聘请有留学归来的教员，主张“富国强种”，改革教育。学校开设的国文、史地占有很大比重。邓拓升高中后，学校进行调整，分科明细，设立了商业师范、普通预科，他上的是普通科文史地系。

邓拓身材瘦小，他的坐位常常安排在教室的前排。老师在课堂上发问，他总是抢先发言，他爱动脑筋，常和同学们辩论一些学习问题。他口才也好，学校举行读书演讲会，他被推举比赛，曾获得第二名。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邓拓贪婪地阅读古典名著和一些历史书籍。并且，与几位要好的同学订了“君子协定”：谁有一本好书，就要互相传看。

课堂上，邓拓听讲很认真，他的记忆力也好，上课时讲授的诗文，他课后都能背下来。中学高年级时，一次教师讲唐诗，出了《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的作文题，让大家自由地和一首诗。

邓拓步罗隐原韵和诗一首，写道：“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教师当堂称赞这首诗写得有些意思。邓宜中得知小儿的《咏蜂》诗后，也十分高兴，夸奖他：吾儿未冠即能诗也。他还对孩子们讲，世上的学问千百种，但“经世之学”当为首要，做人要诚实，诚和信是立身之本。

组织“野草社”

1926年冬，北伐军进入福州。革命军人闽，又一次掀起了革命的热潮。革命军人士上街演讲，青年学生到街上维持秩序。三牧坊中学也有同学参加“战地服务”。

福州北伐前由北洋军阀孙传芳、周荫人统治，大搞白色恐怖，空气极为沉闷。“5·31”运动后，军阀王永泉借口所谓发现赤色刊物，派军警包围并搜查了一些学校。一些学生阅读进步书刊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传看。北伐军人闽，不仅给进步的青年学生带来了政治热情的高涨，同时，传导了大革命的形势，使禁锢的政治气氛有些微的松动。邓拓在这个时期阅读到了大量进步的书刊。他当时的同学傅衣麟回忆说：在大革命的洗礼下，由于年轻人的热情洋溢，追求真理，渴望新知，我们便经常在一起学习进步的书报，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都是那时开始接触的，彼此一样爱好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但同时读得很杂，自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到蒋光慈的《短裤党》，也时常诵读。此外，他们还读一些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书籍，如《天演论》，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哲学著作。邓拓文史哲各类书都读得，开阔了他阅读的视野。

在这一时期，邓拓读到了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一位中学老师收藏了许多进步书报，他把《中国青年》上的一些重要文章用红朱笔圈点起来，并介绍给邓拓和他的同学们读。当时“不少青年人的衣袋里，常常藏着那样一本薄薄的32开的周刊，在反动统治角落里，这样的一本刊物，又往往要秘密地传递过十几人以至更多的人手。”邓拓在二十多年后回忆说，“他的文章对人的感动太深了，只要你读着它，全身就会像火燃一样的发热，他的热情奔放而议论精辟的文字，最能激发人皈依真理走向

革命的勇气和毅力。”

求学和阅读，开阔了邓拓的知识视野，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求知欲也更为强烈，他和同学们结伴成行，开始了广泛的交游。

福州是一个受过血与火洗礼的英雄城市，有许多近代名人的古迹。于山的白塔寺旁的戚公祠，城南闽江边上的纪念抗击法国侵略军死难者的昭忠祠，文天祥抗击元军的土炮台，“左海伟人”林则徐祠堂，都是邓拓和同学们常到的地方。一年夏天，老师组织同学们来到戚公祠，这是为纪念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抗倭英雄戚继光而修建的。祠堂建立在石岗上，青松翠柏环绕，显出古朴、严峻和苍凉。一位历史教员给大家讲述了三百多年前民族英雄的事迹。当年戚家军大破倭寇的情景吸引着同学们。老师讲后又无不感喟地念了首唐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次郊游使邓拓印象很深，不久，他在一把折扇上画了一幅青松图，并题上古人的诗句：“抚孤松而盘桓”，寄托对仁人志士的敬慕。

福州文人爱好一种雅趣：每逢节假日得闲，几位好友相聚“做诗钟”。这是明代以来流传的一种文字娱乐。主事者随便取出两个意思不同的词，再根据其意吟诗。往往是摆上一排桌子，点上火烛，香尽交卷，评出优胜者。邓拓很小的时候，常常同二哥去看“做诗钟”。上中学后，他也参加了“做诗钟”比赛。有一次还得了雨伞的奖品。父亲很支持孩子们这种游戏，说是“练艺”的好办法。邓拓的中学同学傅衣麟、李拓之等，常常到邓家做“诗钟”，有时候邓宜中在一旁观看，参加评点。

1926年前后，大革命形势高涨时，福州青年学生结社蜂起，仅“凤池书院”就有“涤社”、“野草社”等。邓拓与同学李拓之、林洪祺等人组织了“野草社”。起初，有人不同意这个名字，说是太俗了，应该雅一点，而邓拓他们认为，文友结社，自生自发，不就像野草一样吗。当然，它还有更深一层隐喻：在大夜弥天、风沙扑面的时代氛围中，有志者是不甘沉沦的；在肃杀的严冬里，人们的信念如同野草一样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野草社”的成员们分头干了起来，他们联络社友，筹办了一期油印刊物。在这仅有的一期《野草》中，大家指点时政。据当事人回忆，邓拓写了关于国际问题的时评。后来由于大革命失败，福州军阀大搞白色恐怖，青年学生的社团活动被禁止了。

6年多的中学生活，是邓拓在社会和人生漫漫的旅途中的第一站，是他幼年的旺盛的求知期。在动荡的时代，他初步接受了社会和人生的革命的洗礼，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当中学临近毕业时，他在默默地设计自己前行的路。上海那边关于革命文学、科学与人生、社会主义问题等争论，吸引着他。他在选择着。

“补读平生未见书”

1929年夏天，邓拓在福建省立第一高中毕业。秋天，他考取了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

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父亲从城里雇来人力车送子求学。邓拓是从台江码头乘船去上海的。轮船驶离福州城已是薄暮初合，不到十分钟就到了马尾港。这块曾经多次留下过他足迹的地方，在暮色沉寂中更为庄严冷峻。文天祥的古炮台、庄严的昭忠祠等都隐退在茫茫夜色中。耳边哗哗的江流，眼前匆匆而过的山峦和树丛，似乎都在提醒他，这是一次不平常的远行。于是邓拓随即写了《别家》一诗，抒发了他当时的心情：“空林方落照，残色染寒枝。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首天柱低。”

邓拓就读的光华大学，原属圣约翰大学。1925年6月5日，学生声援5·31运动，举行反帝爱国示威。这一活动受到美籍校长的“非理压迫，阻止我们的爱国运动”，一部分教员和学生“慷慨离开学校”，另辟新址成立光华大学。学校注重德育培养，告诫学生“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学校还附设平民学校，注重同社会交往。1927年11月，鲁迅亲临光大作了《文学和社会》的著名演讲，这些对一个认真求学、不断进取的青年学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学校课程设置严格。邓拓所在的文学院把“基础课必充实”，“各种学说，无所偏至”，“观察实际”，“自行读书”，“理论与技术并重”等作为“教授宗旨”。在学校新设的选读课“经济名著”中，有“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库巴卫克诸家之代表”。大约是在入学的第二学期，邓拓开始大量阅读一些经济学和哲学名著，读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上海这个被诮为“冒险家乐园”的地方，有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也有严峻的生活和斗争。白天，邓拓除了上课就去图书

馆；晚上，他回到住地，关在小屋子里刻苦攻读。日积月累，他积累了不少资料卡片。他曾说上海是一个“书城”，要读的书太多了。在他给友人的信中，引用清人的“补读平生未见书”的诗句，形容“坐拥书城”紧迫急切的求知心情。邓拓写道：“两间憔悴一儒生，长对青灯亦可惊。不卜文章流海内，莫教诗酒误虚名。得侔前辈追真意，便是今生入世诚。白眼何妨看俗伦，幽怀默默寄书城。”诗中描绘了作者“青灯”苦读的生活，虽然身处酒肆洋场，但轻薄时风世俗，在默默的攻读中寻求“真意”，效法“前辈”，一旦思想有了收获，认定了革命的道理。正如作者几十年以后谈到他读了一些革命理论的书籍后思想上得到提高一样，是“皈依真理”，接受了真理的武装，“增加了革命的毅力和勇气”。

邓拓在光华大学读了两个学期，到1930年6月，他参加了当时日益开展的左翼文化活动，离开了光华大学。

铁窗风雨唱“高歌”

1930年初，左翼文艺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影响了大批青年学生们。是年冬天，邓拓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这个组织是“左联”的兄弟组织。同他一起参加的有经济学家许涤新等人。

“社联”的活动主要是在党团组织的秘密领导下配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动群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散发标语传单等。它注重加强盟员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严厉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它的一些领导成员王学文、艾思奇等曾主办刊物发表有关经济、哲学的文章。这给邓拓一些影响。当时，“社联”党组织活动也开展得活跃。邓拓参加“社联”后，通过实际斗争锻炼和理论学习，逐步在政治思想和信仰上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夏，邓拓参加了上海法政学院的一次考试，后又插班进入上海法政学院政治经济系。

入党后，邓拓一面在法政学院学习，一面积极的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他担任了中共上海法南区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中共南

市区工委书记等职。他同中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支部书记张稼夫、党的地下工作联络员季步飞等人单线接头，把党的指示以及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及时向上面汇报和向下面传达。

“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斗争情绪高涨。上海地下党人根据人民群众激昂的爱国热情，组织一些活动，掀起了反帝爱国的热潮。9月底，法政学院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并发出宣言说：“国难当头，团结起来，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危亡于千钧一发”，学校组织抗日演讲队，分赴卢湾、八仙桥、龙华路等地进行抗日形势的宣传。10月，并邀请著名学者李达、潘梓年等到校演讲中日问题。一部分留日学生归来，也被邀作报告。邓拓是学生会干部，他出面参加了一些会议组织的接待工作。

1932年12月11日，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组织一次纪念活动中，邓拓被捕了。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多次遭到巡捕和警探的逮捕，有的或因证据不足，或迫于抗日的压力，很快就释放。邓拓曾有两次被捕，他化名丁丙根，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释放了他。这一次，敌人认出了丁丙根是曾多次被捕的“嫌疑犯”，把他当作要犯押往苏州军人反省院。

在关押期间，敌人几次提审邓拓。一次敌人先让一个姓徐的叛徒出庭说降，威逼邓拓交出地下党员活动的情况，交出张稼夫等人的地址，在刑堂上，邓拓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敌人残酷地用铁钳烙他的腿和脚，他的腿部后来留下了多处灸伤的痕迹。

铁窗生活，身体痛遭皮肉之苦，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不可摧毁。但离开了火热的斗争生活，离开了战斗的同志们，特别是土牢牢室，没有书报，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心中感到若有所失。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抄录牢房的“题壁诗”，借以激励大家的斗志。当时在难友们中间广为传诵的是一首恽代英烈士的《狱中绝诗》。恽代英1930年在上海被捕后，押到南京。1931年4月牺牲。他在诗中写道：“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邓拓后来回忆当时情况说：“被囚在苏州的一部分政治犯传诵这首诗，几乎人人都抄录。另外，杨匏安烈士的诗《临刑别狱友》也是大家广为流传的。同时，不少人自己写诗抒怀，激励大家的意志。

邓拓写了一些“狱中诗”。刚入狱时，他在《入狱》诗中抒发了共产党人面对铁窗风雨引吭高歌的战斗豪情：“去矣勿彷徨，

人生几战场？廿年浮沧海，正气寄玄黄。”“大千枭獍绝，一土死何妨！”身陷囹圄，敌焰其炽，个人的安危是小，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他挂念战友，寄怀战斗的未来：“征侣应无恙，新猷倘可长”，坚信，“碧海终填尽，黄河必涤清。今日穷插棘，来日矢披荆。”

1933年春，邓拓父亲托人将他保释出狱，邓拓有感于此，作《出狱》诗一首：“只身天地余残泪，一眼河山尽断鸿。莫道群生都懵懵，明朝四野又烟烽。”

崭露新思想的光芒

秋天，邓拓出狱后回到了福州，他拜访了一些同学和老师。人们对“九一八”以来中国严峻的形势极为关心，特别是上海“一·二八”抗战后，中国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的增强，在闽西的一带我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也是一些关心时局的人们谈论的话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文化战士，邓拓在计划着今后的路如何走？

这时，中学同学傅衣麟刚好从厦门回来度假，他们相约到乌石山图书馆去读书。半年的监禁，邓拓对外界的情况了解甚少，他想多读些书报，认真地“补上这一课”。他特别注意翻阅一些新创刊的刊物。在《新中华》半月刊上，他看到了张东荪、叶青等人的关于唯物辩证法问题的哲学论争的文章。对于张东荪等人挑起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讨论，早在30年代初，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邓拓在上海读大学时就留意了。1930年前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内进步的思想界开展了一个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的运动。与此同时，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竞相出现，也有的从西方唯心主义的思想武库中，搬出康德主义、杜威主义、贝克莱主义等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进攻，或者装扮成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些思想的论战焦点集中在哲学消灭与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等问题上。

1933年前后，随着前两个问题的被驳斥，这些反动哲学的代表者们又变化着手法，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旗号，肆意歪曲和诋毁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这场关于新旧的哲学问题的

论争更趋复杂和深入。

1933年9月,《新中华》杂志发表了张东荪的《动的逻辑是可能的吗?》,邓拓认为这篇文章是为了某种的“党派观念和偏见”,“在学术上故意诬蔑和攻击,是极端无聊的举动”。为了“探求真理的究竟”,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谬误进行反驳,10月,他以“邓云特”的署名发表了题为《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一文。

邓拓首先批驳了张东荪混淆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是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罢了”的谬论,指出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人们观察社会中的重要性。其次,作为一篇论驳文字,不仅有犀利的批判锋芒,也有严肃而确当的理论阐述,在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上表明了作者的深刻认识。比如关于认识事物的主体和客体,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观等都是十分精当的。更重要的是作者从狱中出来不久,即参加了这场维护唯物辩证法的论争,而当时作者才23岁,显示了邓拓的理论勇气和思想锋芒。

发表有关哲学论文是邓拓用笔参加思想领域战斗的最早实践。他在大学时代接触了革命思想的哺育,并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在选择文化道路时,他用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这也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基础。

在发表了哲学论战的文章后,邓拓抓紧时间读书,找资料,打算继续研究和清算张东荪等人的唯心哲学思想。12月,驻守在福州的国民党19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的领导下,成立了人民政府,宣布抗日反蒋。邓拓参加了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宣传联络工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中掀起了抗日反蒋的热潮,人民政府利用人民高涨的革命热情,举行了一些庆祝和游行活动,扩大宣传声势。邓拓白天外出,晚上走访一些工人家庭。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反扑,内外夹攻,人民政府终因寡不敌众,到次年一月宣告失败。“闽变”失败后,反动军队又开始了大逮捕。邓拓被通缉,家人为他安全担心,他只好匿迹在家,仍然去乌石山图书馆和福州的一些藏书地去阅读,并着手研究清代闽籍诗人张亨甫的诗作。

次年春天,邓拓又到了上海,在六里桥一个中学任教员,通过友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不久,大哥邓伯宇从河南开封来信,让他前去读书。秋天,他西行北上,来到了开

封。

“中州客梦寒”

邓拓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是曾作为中共党的领导人的罗章龙（当时名为罗仲言）教授。他亲自为邓拓办理了入学手续。除了在河南大学就读外，他利用课余时间到西北中学、济汴中学兼任历史、英语等课教员。当时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和国民党教育制度的腐败，校纪松弛、学生们除了考试到校外，平时不少人干脆不到校，还时常发生有钱人家的学生买取毕业文凭的丑闻。这给一些进步的学生们从事地下工作带来了方便。

河南大学是庚子赔款后开办起来的，30年代初期，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进步的学者应邀到校任教。像李达、范文澜、邓初民等人都曾到这里讲授哲学和历史等，使理论研究活跃一时。河南大学党组织在30年代初也较活跃。后来，当一·二九运动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阻挠学生运动，党的组织受到一定的破坏。在一段时间曾发生过有五六个党小组活动，因不是一个系统没统一起来。这种分散的状况，当敌人凶残的魔爪伸向学校时，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

1935年，“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展开后，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36年暑假后，邓拓在开封参加了“民先”。他先后担任河南大学支部、开封“民先”运动支队长。这年夏天，中共北方局鉴于开封一带党组织和“民先”运动受到破坏，委派去洛阳接受任务的刘子厚同志到开封进行联络，刘子厚到开封后召集“民先”运动负责人邓拓、杨怀山等人联系工作，组织队员按照党的有关指示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宣传工作。“民先”队员多是一些大中学生和热血青年，在开封的活动是半公开的，主要工作是散发传单、联络工友，进行爱国救亡的宣传。

邓拓在开封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他对中国经济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1935年10月，他以“邓云特”笔名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开始了这一时期经济历史问题的全面研究。

当时，国民党为了配合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在白区发动了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史学领域，首先是托派分